

新世纪英语语言文学界面研究丛书

认知文化研究对话录： 文学、语言与美学

**Conversations on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

Literature,
Language,
and Aesthetics

Frederick Luis Aldama,
Patrick Colm Hogan 著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新世纪英语语言文学界面研究丛书

认知文化研究对话录： 文学、语言和美学

**Conversations on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

Literature,
Language,
and Aesthetics

Frederick Luis Aldama,
Patrick Colm Hogan 著
刘正光 邓忠 导读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文化研究对话录:文学、语言和美学/(美)弗雷德里克·路易斯·阿拉德马,
(美)帕特里克·科尔姆·霍肯著;刘正光,邓忠导读.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8

ISBN 978-7-5446-5615-3

I. ①认… II. ①弗… ②帕… ③刘… ④邓… III. ①认知科学—语言学—研究—英文
IV. ①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1768号

Conversations on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 Literature, Language, and Aesthetics by
Patrick Colm Hogan and Frederick Luis Aldama

Copyright: © 2014 by Patrick Colm Hogan and Frederick Luis Aldam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English reprint with a Chinese introduction: 2018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the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本书由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通过大苹果公司授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仅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香港、澳门、台湾除外)销售。

图字:09-2018-169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梁晓莉

印 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5.5 字数 310千字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5615-3 / H

定 价: 49.00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质量服务热线: 4008-213-263 电子邮箱: editorial@sflep.com

“新世纪英语语言文学界面研究丛书”
专家委员会

主 任：熊沐清

顾 问：申 丹 王 宁

委 员(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董洪川 封宗信 黄国文 刘世生 刘正光

乔国强 冉永平 尚必武 王东风 王克非

文 旭 杨金才

总 序

熊沐清 董洪川

自劳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推出第一套“界面丛书”(The INTERFACE Series)以来,“界面”(interface)日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一种重要对象或范式。在国内,“界面”及“界面研究”近年来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但国内一些同仁对界面的涵义、学科意义、方法论特征等方面仍了解不多,期待有更多的推荐与介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长期服务于我国外语教育与学术事业,努力开拓进取,在外语界面研究领域也是独具慧眼,委托我们主持引进一套英语语言文学界面研究丛书。经过多方努力,这套丛书即将面世,借此机会,我们谈谈自己对“界面”的认识。

“界面”译自英文interface,该词也被译为“接口”或“接面”,在不同学科中广泛使用。在物理学中,它指两个或多个不同物相之间的分界面,如气/水界面;在地质学中指“不连续面”,即地质上不同圈层的分界面;作为设计用语,界面是人与物体互动的媒介;作为电脑用语,界面是用户显示器屏幕上的图形状态;等等。它还可以是“无形”的,用以指学科间的交叉,比如“物理、化学的界面彼此频繁交叉,以至于其确切的界线模糊难辨。其界线与其说是由于任何内容方面的明确划分,不如说更多地是由语言和方法的逐渐变化来标志的,它已成为整个分子与原子、表面与界面、液体与固体科学在理论、应用上的不断进步之源”(克莱恩,2005:8)。

“界面”反映了事物、现象或观念之间普遍存在的联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因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

II 总序

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只有形而上学者才把“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看作“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马克思、恩格斯,2012: 359-361)。一个半世纪过去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科学研究日益鲜明地证实了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关于事物间普遍联系与运动变化的科学论断。

事物间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这一特征决定了学科间的相互联系和交织,它是界面研究的哲学基础与方法论依据,而学科间的相互联系和交织反映在科学研究上就是“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美国学者朱丽·汤普森·克莱恩在描述当今时代的知识状况时说:“今天,知识描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重新考量学科之间的关系,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构成同一对象。随着新的组织聚合层次揭示出来,‘多学科’正成为对研究对象的常见描述”(克莱恩,2005: 62)。自20世纪60年代起,“学科互涉”开始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20世纪60—70年代的口号‘学科互涉的时代到来了’提上了学术界的议程”,“边界跨越(boundary crossing)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明确特征”(克莱恩,2005: 1)。所谓“学科互涉”,即学科边界的跨越问题,也就是界面的问题。跨越学科边界,其实质就是跨越“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马克思、恩格斯,2012: 352)。界面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知识背景中逐渐为人们所关注。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劳特里奇出版社就率先推出了一套界面研究丛书。该套丛书包括如下书目:《叙事:批评语言学导论》(*Narrative: A Critical Linguistic Introduction*)、《语言、文学和批评实践:文本分析方法种种》(*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ritical Practice: Ways of Analysing Text*)、《文学、语言与变化》(*Literature, Language and Change*)、《行动中的文学研究》(*Literary Studies in Action*)、《女性主义文体学》(*Feminist Stylistics*)、《通俗小说中的语言》(*Language in Popular Fiction*)、《语言·文本·语境:文体学论文集》(*Language, Text and Context: Essays in Stylistics*)、《笑话的语言:文字游戏分析》(*The Language of Jokes: Analysing Verbal Play*)、《语言、意识形态和视点》(*Language, Ideology and Point of View*)、《英语诗歌的语言史》(*A Linguistic 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关于语言的文学》(*Literature about Language*)、《文本介入:文学研究的批判性和创造性策略》(*Textual*

Intervention: Critical and Creative Strategies for Literary Studies)等。

从这套丛书的用例可以看出，“界面”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指不同学科间的相互联系和交织交汇。根据用例可以得知，“界面”大致指三种研究类型：第一种是学科之间的互涉和联系，上述劳特里奇出版社那套丛书的绝大部分即属于此类。比如《叙事：批评语言学导论》，该书以批评语言学视角探讨叙事，其学理正在于叙事文类与语言学科之间的广泛联系。首先，叙事文本是语言产品，当然可以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第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叙事学本身就把语言学作为自己的主要基础，罗兰·巴特就曾明确指出：“在目前的研究阶段，把语言学本身作为叙事作品结构分析模式的基础，看来是合乎情理的。”（巴特，1987：110）其三，叙事研究和语言研究的互涉呈现出日益密切的趋势，2015年出版的《布莱克威尔叙事分析通览》（*The Handbook of Narrative Analysis*）即是一例。该书是“布莱克威尔语言学通览”（*Blackwell Handbooks in Linguistics*）系列中的一种，是语言学而不是文学著述。编者在“导论”中把“叙事分析”界定为：研究普通人在不同环境中讲述的故事。虽然这里的“叙事分析”不同于文学领域的叙事研究，但编者承认，“叙事分析”是一个丰富多样的研究领域，它是由许多学科传统所共同形成的，其中包括了文学领域的“叙事学”（*narratology*）。而作为语言学研究之一的“叙事分析”，本身也可归于宽泛的语言学领域，如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话语分析等。（*Anna De Fina & Alexandra Georgakopoulou, 2015: 1*）所以，“叙事分析”也是一种典型的界面研究。

第二种类型是借鉴性的或是派生性的学科互涉，产生出新的边缘学科，比如“女性主义文体学”。近年来层出不穷的一个现象是：受认知科学影响，衍生出许多基于“认知”的边缘学科，比如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文化学、认知教育学、认知文化学、认知人类学、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文体学、认知叙事学、认知诗学等等，不胜枚举，这些都是第二种类型。其中一些算是“二次派生”的边缘学科，比如“认知社会语言学”，首先出现的是边缘学科“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然后是二次派生的边缘学科“认知社会语言学”（*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又如“认知生态批评”，最先是“文学批评”（*criticism*），然后出现“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之后再衍生出“认知生态批评”（*cognitive ecocriticism*）。

IV 总序

第三种类型则是指学科分支之间的互涉,目前主要指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的界面研究。这一方面国外的著述颇多,如 *Cognitive Interfaces: Constraints on Linking Cognitive Information* (Zee & Nikanne, 2000)、*Academic Writing at the Interface of Corpus and Discourse* (Charles, Pecorari & Hunston, 2009)、*Exploring the Lexis-Grammar Interface* (Römer & Schulze, 2009)、*Interfaces-Recursion=Language? Chomsky's Minimalism and the View from Syntax-Semantics* (Riemsdijk, Koster & Hulst, 2007)、*Exploring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Valin, 2005) 等。值得注意的是,牛津大学出版社还曾推出过一本通览性的语言界面研究文集:《牛津语言界面通览》(*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Interfaces*, Ramchand & Reiss, 2007)。

以上三类研究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跨越了单一学科边界,是一种“边界作业”(boundary work),是内容、方法或概念等的融合、交汇或借鉴,人们打破并重构知识单元之间的界线,通过形成某种惯例来建立一个新的学科或研究范式。前两种类型都可以视为广义的界面研究。其中,第一种类型因为涉及学科之间交叉、交汇,可称之为“平行型界面研究”;第二种是以某一学科为基础,吸收、借鉴了另一学科的学理、方法或概念体系,可称之为“衍生型界面研究”,比如 feminist stylistics (女性主义文体学),即是以 stylistics (文体学)为本体和基础,吸收、借鉴了女性主义研究成果,产生了新的边缘学科。又如 cognitive poetics (认知诗学),则以 poetics (诗学)为本体和基础,吸收、借鉴了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产生了新的边缘学科。“借鉴”是这一类型的方法论的突出特征,而“衍生”则是其典型性结果。第三种是狭义的界面研究,特指学科分支之间的交接和交织,可称之为“交织型界面研究”,比如语言学中句法与语义之间的交织而形成的界面。对此,《牛津语言界面通览》的主编 Ramchand 和 Reiss 在该文集的“导论”中也指出:该文集所论的“界面”是取其狭义(a narro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rm “interfaces”),指“语法中那些推定的语言模块间的信息连接和传递”,当然,他们同时也认为,“界面”一词也可以“合法地应用于语言能力和认知的其他方面(如视觉和推理)或者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各种联系(比如哲学、心理学等)”(Ramchand & Reiss, 2007: 2)。

人们一般把“界面”理解为“跨学科”。所以,当 interface 用来指

称学科间的关系时,它与transdisciplinary以及cross-disciplinary有密切联系,且经常互换使用,许多人不加区别地使用它们。但事实上,它们之间是有微妙区别的。尽管它们的涵义与interface非常接近,但transdisciplinary和cross-disciplinary这些词一般指学科之间的比照或借鉴,却不能用来指学科分支(如语义—句法、音位—句法、语音—音位等界面)之间的关系,它们所指谓的“跨学科”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相比之下,interface一词绝不仅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指谓,它具有本体论意义——它是一种实存,是实际存在的认识论对象。当我们谈论学科A与学科B的“界面”时,这里的“界面”指的是学科A与学科B相交的那一部分——即使这个“相交的”部分占去了该学科的大部疆域。正是因为这种“相交”的特征,使“界面”不同于一般的“跨学科”而具有自己的本体论属性。其实,汉译“接口”或“接面”或许更接近interface的原意,因为这个“接”字表明了两者间的直接关系。

基于这种语义蕴涵,“界面研究”虽然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种“跨学科研究”,但它与一般的跨学科研究是有所不同的。严格说来,“界面研究”应该是“对某些学科或学科分支之间的**界面**的研究”。比如,文学和语言学,社会学和宗教学,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界面”,而对这些“界面”的研究即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界面研究”。“劳特里奇界面丛书”的大多数书目即属于这类研究。设想:存在着对象A,研究它的学科是学科A。现在,我们发现对象A的某一部分与学科B的某一部分对象一致或相似,于是我们可以用学科B去研究对象A那些一致或相似的部分,这就产生了对象A与学科B的界面研究。叙事与批评语言学的界面研究就属于此类。以前述《叙事:批评语言学导论》为例,本来,研究叙事(对象A)的学科是叙事学和小说理论(学科A),现在人们又用批评语言学(学科B)去研究叙事。这种研究的“界面性”就在于叙事文类的语言并不是纯粹客观中性的,而批评语言学的主要目的是“揭筑语言意识形态维度之谜”(Christopher Hart, 2010: 4),叙事文类蕴涵意识形态维度的这一“部分”与批评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相交”性,形成“界面”,于是就有了运用批评语言学去分析叙事文类的“界面研究”。这种研究自然也就是“跨学科”的研究。但是,批评话语分析绝不是也不可能取代叙事学的研究,两者间只不过有部分研究对象重合,这些重合的部分即是“界面”。即使如此,两者的研究目的、取向、方法等也不是雷同的。

我们再以“认知”为例来进一步说明“界面”的本体论存在。John T. E. Richardson (Caplan et al., 1997:10) 在谈到人类认知的特性时指出：“人类认知处于生物学和文化的界面”(Human cognition is situated at the interface between biology and culture)。也就是说，人类的“认知”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认知”必须依赖于大脑和身体(包括各种感官、情感等)，这就是生物学的部分；但人类的认知又受到特定文化的影响(“认知”本身也影响“文化”的产生和传承等，这里有着双向的运动)，所以，认知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认知普遍性和文化特定性(cognitive universal and cultural specific)相互依存和作用。Richardson这句话里的“界面”，指的就是人的生物性存在与文化之间与“认知”相关的那些部分或领域，因为“认知”既不能仅仅是生物性的，也不能仅仅是文化性的。换言之，“人”是文化性动物，这就具有“文化”的属性；同时，“人”毕竟又是一种“动物”，也就必然具有生物性。根据具身认知理论的基本观点：人类心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身体结构(形态、感觉系统和运动系统)及其与物理环境的互动所决定的。这一概念来源于20世纪晚期的语言学、哲学和认知心理学。这种人类(具身)认知的概念，从神经生物学意义上说是受到制约的，但也是环境定位、语境依存和文化索引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对“人类认知”的研究就是要研究“处于生物学和文化的界面”的人类心智活动结构、机制、规律和特点等，而不是仅仅进行生物学和文化学的“对比”；也不仅仅是借用生物学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与“认知”相关的文化现象，或者反过来如法炮制。注意这里所指的“界面”——无论是生物的还是文化的——是实际存在、可供研究的对象；同时，它又是涉及多个学科的论题或论域，不是仅仅属于某一学科的研究课题。另一方面，由于“界面”通常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科(这就是所谓“学科互涉”)，对“界面”的研究也就必然在方法论上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因此，界面研究既有方法论意义，也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界面研究”虽然是一种“跨学科研究”，但两者不能等同。“界面研究”是对于特定对象即“界面”的研究(一般是跨学科的)，其重点是研究的特定对象性；而“跨学科研究”则是对某一对象或多个对象的研究，其重点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多学科性。学科互涉不是两个学科间的比较、对照。比如，将中国诗人陶渊明

与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进行对比,这种平行比较是一种跨文化、跨文明、跨语言等多方面的跨学科研究,但陶渊明与弗罗斯特二人之间没有任何本体论意义上的直接联系,只有类比或对照。而“界面”则不同,“相交的”两个(或以上)部分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说,陶渊明与弗罗斯特二者间不存在“界面”。但是,如果我们对陶渊明或者弗罗斯特进行认知文学的研究,这种研究就是“界面研究”,因为如前所述,“人类认知处于生物学和文化的界面”,因而它是涉及多个学科的论题而不是仅仅属于某一学科的研究课题。1990年,艾森克(Eysenck)编撰的《布莱克威尔认知心理学词典》(*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Cognitive Psychology*)是这样界定认知科学的:“认知科学是对知识的获取与使用进行的学科互涉研究,它包括人工智能、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神经科学、教育等。”换言之,对“认知”的研究涉及上述多个学科,其中任何一个单一学科都难以独立完成对“认知”的全部研究课题,因为“认知”不是仅仅属于某一学科的孤立的研究课题。所以,认知研究领域的一个共识就是:认知研究必然是学科互涉的。

关于认知研究的学科互涉性(*interdisciplinarity*), Neil A. Stillings 说得很清楚。Stillings (1999:13)在《认知科学导论》(*Cognitive Science: An Introduction*)中列举了组成认知科学的五大核心学科:神经科学、语言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和(涉及心智的)哲学。他指出:这五大学科没有哪一个学科能够独揽认知科学的研究对象,只能各自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比如,神经科学主要关注神经系统的组织;语言学关注人类语言的结构和语言习得的本质特性;哲学关注逻辑和意义,旨在厘清诸如信息和知识之类的认知科学的基本概念;心理学关心人类普遍的心智能力,比如注意和记忆等等;计算机科学专注于人工智能的种种可能性。认知科学则囊括所有这些学科关注的问题。因此,认知科学家们虽然在某一特定领域确有专攻,但仍然能够从其他相关学科中获益良多。重要的区别是这五大学科用以研究心智本质的方法不同。心理学家强调控制下的实验,以及对自然发生的行为的详尽的、系统的观察;语言学家通过分析说话人对合乎语法的及不合乎语法的句子的本能,或者观察儿童言语中的错误,去检测那些关于语法的假设;人工智能研究者们则通过编写那些执行智能行为的程序,并观察它们在何处崩溃,以此来检验理论;哲学家们探究认知科学理论中概念的连贯性,系统阐明好的理论必须满足的那些普遍的限制条件;神经科学家

们则要研究大脑中信息处理的生理学基础。

以上的描述似乎只是证明认知研究的跨学科性,其实不然。一方面,认知研究的确是跨学科的;但另一方面,上述描述清楚地揭示了“认知”与各相关学科的密切联系,它与这些学科具有“不可分离性”(inseparability),就像Ute Römer和Rainer Schulze(2009: 1)断言词汇与语法不可分离一样。“认知”使这些不同学科聚集在一起,共同组成了现在的认知科学学科群。在这个学科群里,相关学科围绕“认知”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学科间对话”(interdisciplinary conversation)。截至目前,在这种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学科间对话中,认知文学研究(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是其中的典型范例。Lisa Zunshine(2010: 5)在《认知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中指出:“如同在其他交叉学科领域中的情形一样,对文学和文化的最令人激动的认知研究来自那些发展了认知科学与更为成熟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界面的学者们。”这里,“界面”是他们成功的一个主要条件。这种“界面”涉及神经科学、话语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认知进化心理学(cognitiv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认知进化人类学(cognitive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认知语言学和心智哲学等。Karin Kukkonen(2017: xi)在《认知诗学的前历史:新古典主义与小说》(*A Prehist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Neoclassicism and the Novel*)一书的前言中也指出:第二代认知叙事研究方法致力于研究文化与认知之间的界面。

为什么以学科互涉为特征的界面研究会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异乎寻常的热潮?首先,界面研究是当代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这也就是克莱恩所说的“学科互涉的内生性”(克莱恩,2005:17)。西格玛·西(克莱恩,2005: 60)把当代科学研究的问题概括为三类:

第一类问题:传统学科内部的学术问题。

第二类问题:多学科问题,它们在本质上与其说是策略一行为的,不如说主要是学术的,但并不能在单一学科内部成功地进行。

第三类问题:确定无疑的多学科问题,由社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

以上三类问题中的第二、第三类问题,都不是单一学科能够成功解决的,需要借助于界面的研究。正是这些超越了单一学科界限的复杂问题,“制造出一种学科互涉需求。复杂问题使得研究远离传统上认

为的学科问题,它们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多维的、含混的、不稳定的。”(克莱恩,2005:49)即使是第一类问题即传统学科内部的学术问题,人们也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单靠传统学科的“孤军奋战”可能难以取得理想的成绩,因此,从方法论上需要借力于其他相关学科;更有可能的是:人们会发现某些论题已经不仅仅是某一传统学科内部的问题了。比如语言学中的“焦点”(focus),利奇和肖特认为,焦点虽然是一个音位学的问题,但它在句法中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末端焦点是书面语篇中制约成分序列的原则之一(Leech & Short, 2007: 171-172)。所以,它是一个界面的问题。又如“时间”(time),它曾经是古典哲学、宗教的经典话题,现代哲学、语言学、文学、文化等学科也对它展开了深入的研究,Vyvyan Evans(2003)所著的《时间的结构:语言、意义和时间认知》(*The Structure of Time: Language, Meaning and Temporal Cognition*)一书,则从现象学哲学角度讨论了时间概念,并且从概念隐喻、时态等表现形式探讨了诸如延续性、瞬间性、事件等各种时间涵义和时间结构,堪称时间研究的典型性界面范例。

概括而言,“界面”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它必然涉及两个及两个以上学科;

第二,“界面”产生于互涉学科间的“边界模糊”(the fuzziness of boundaries),比如,认知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边界模糊”(Zunshine, 2010: 3);

第三,“界面”是一种本体的存在,它本身不是一种研究方法,但学科互涉性使得界面的研究必然是一种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

因此,第四,“界面研究”既具有本体论意义,也具有方法论意义。

概言之,“界面”是一种本体论存在;“界面研究”是对“界面”的跨学科研究而不是针对一般对象的“跨学科”研究——这是理解“界面”和“界面研究”的关键。

界面和界面研究对于科学研究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不妨用四个词来概括界面研究:胸襟、视野、方法和取向,即开放的胸襟、开阔的视野、多样的方法、创新的取向。

首先,它们代表着一种开放的胸襟,启发我们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新事物,特别是那些我们还不熟悉甚至与我们的习惯格格不入的新事物。比如,将实验的方法引入文学研究,这种研究迥异于千百年来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和接受,所以,有些人对此持否定和

怀疑的态度。殊不知许多这类实证性研究是针对文学基本理论的,不是针对文本解读的。换言之,它不是狭义的文学批评的方法,而是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缺乏开放的胸襟,又以文本分析和解读的要求去比照它,缘木求鱼,不免失望;或者方枘圆凿,导致怀疑与否定。开放的胸襟必然伴随着发展的眼光。美国认知文学研究的主要人物之一 Lisa Zunshine 注意到:1999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组织了以“文学认知研究方法”为主题的分组讨论,参加的人员有250人,十年后(即2009年)同样主题的分组讨论,参加人员已增至1221人(Zunshine, 2010: 1)。

界面研究需要开阔的学术视野,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有利于新兴边缘学科的产生。可以说,界面与界面研究就是“知识增长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学术创新的一种主要的内在动力。以叙事研究为例,由于叙事是人类最古老、最普遍的话语行为,它就成了“由社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多学科问题”,于是,在传统的小说—叙事文研究之外,又出现了叙事学、叙事心理学、教育叙事、女性主义叙事学、政治叙事学、历史叙事学、法律叙事学、空间叙事学等等。这就是克莱恩所描述的现象:“在20世纪的进程中,学科分化并重组成新的专业,是知识增长的主要形式,这种现象导致了大分化和大汇流”,“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构成同一对象。”(克莱恩,2005: 55, 62)又比如在近些年来日益兴盛的认知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认知酷儿理论、认知唯物主义、认知历史主义、认知女性主义、认知生态批评、文学达尔文主义等等,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理论视野和研究领域,相应地也需要人们以开放的胸怀对待它们。

界面与界面研究还具有突出的方法论意义,“学科互涉的说法一般是在方法论基础上提出来的”(克莱恩,2005: 85)。Stillings(1999: 13)也指出:认知科学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认知科学”正是典型的界面学科群。它作为源学科(parent discipline),衍生出了许多基于认知科学的新兴学科,如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文化学、认知教育学、认知文化学、认知人类学、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文体学、认知叙事学、认知诗学等等。这些新兴边缘学科使我们获得新的方法论启示与借鉴,比如认知文体学,它的方法论资源肯定比传统文体学更为丰富。

第四个意义是推动研究的深化和创新。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

M·石里克曾经明确指出：“当一个人在某个特殊科学中获得了知识（从而知道这个或那个现象的原因）时，当探索的头脑又进一步追问原因的原因（也就是追求可以从中推引出他所获得的知识的更一般的真理）时，他很快就达到他的特殊科学的手段已不能使他再继续前进的地步”，这时，石里克的建议是进入哲学领域：“解释向前推进的过程最终进入的最一般的领域，就是哲学领域、认识论领域。”（石里克，2005：18）这段话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他主张“进入”的领域不是原先的研究领域即“某个特殊科学”，而是其他的领域，这就涉及了跨学科或学科互涉；其二，他所说的“哲学领域、认识论领域”，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认知科学”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正是基于上述对界面和界面研究的认识，我们从国外近年出版的大量界面研究著述中遴选了部分精品，组成了这套“新世纪英语语言文学界面研究丛书”。首批计划引进六本，分别是：《语言、文化与认知的多维视角：认知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的交集》（*Approaches to Language, Culture, and Cognition: The Intersection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Masataka Yamaguchi et al. eds., 2014）、《为学而读：儿童文学的认知进路》（*Reading for Learning: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Children's Literature*, Maria Nikolajeva, 2014）、《文学语言和人物塑造的语料库方法：析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A Corpus Linguistic Approach to Literary Language and Characterization: Virginia Woolf's The Waves*, Giuseppina Balossi, 2014）、《翻译的艺术》（*The Art of Translation*, Jiří Levý, 2011）、《网络语用学：网络语境中的交际》（*Cyberpragmatics: Internet-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Context*, Francisco Yus, 2011）和《认知文化研究对话录：文学、语言和美学》（*Conversations on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 Literature, Language, and Aesthetics*, Frederick Luis Aldama & Patrick Colm Hogan, 2014）。我们的设想是原版引进，以便让国内读者能够读到“原汁原味”的著作。同时，我们邀请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为每本原著撰写中文导读，意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提纲挈领的介绍和评述，以便读者能够尽快了解该书的基本脉络、主要内容和各章重点以及该书与相关学科、著述之间的纵横关系，从而获得更大助益。

这六本书都是界面研究的典范之作。其中，《翻译的艺术》一书作者列维（Levý）本身即是一位“界面性”的学者。他既是翻译理论家也是知名的文学和文学史专家，精通多种语言，对英语、捷克语等多种语

XII 总序

言及文学均有很深造诣,能够从美学、艺术理论、语言学、符号学、信息理论等相关学科中汲取广泛而深刻的思想,所以,《翻译的艺术》这本书成功运用了多种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也深入而精辟地讨论了文学翻译、翻译美学、诗歌和戏剧翻译等多个学科领域,堪称典型的界面研究之作。《文学语言和人物塑造的语料库方法:析伍尔夫的〈海浪〉》这部著作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借助计算机,着重从词类和语义范畴两方面研究文学语言和人物塑造,横跨计算机、语言学和文学学科,还借鉴了认知研究;既有量的统计,又有质的分析,无疑也是一部界面研究著作。《网络语用学:网络语境中的交际》作为网络语用学研究的第一本专著,涵盖了经典语用学、网络交际的语用现象及其特征、网络交际的类型、体裁、模式及多种交际媒介等多方面内容,充分体现了语用学研究与科技发展、社会实践等之间的有效结合与融汇。《语言、文化与认知的多维视角:认知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的交集》一书同样是非常典型的界面研究著作。该书从语言、文化与认知三个不同学科切入研究对象,而它的研究对象正是认知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之间的界面,“交集”(intersection)一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为学而读:儿童文学的认知进路》的“界面”在于用认知的和教育的视角去研究儿童文学这一对象,因为儿童文学中存在着与认知和教育相关的界面。认知与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界面,我们在前面介绍过Richardson关于“认知”的描述(“人类认知处于生物学和文化的界面”),所以,《认知文化研究对话录:文学、语言和美学》的讨论对象是界面的,而且两位对话者将文学、语言、美学这三个不同学科和话题置于“认知文化研究”框架之下,界面性更为突出。

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引进出版,首先应该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学术事业部的大力支持,尤其是蔡一鸣老师的全程负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她最初的提议,就不会有这套丛书的推出;没有她全程的认真负责,也不会有这套丛书的顺利出版。我们还要感谢应邀撰写导读的专家和他们的团队成员,他们于百忙之中撰写导读,为本丛书增色不少。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对外语界同仁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Caplan et al. (eds.). 1997. *Gender Differences in Human Cognition*. London &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 Fina, Anna & Alexandra Georgakopoulou (eds.). 2015. *The Handbook of Narrative Analysis*. Chichester, West Sussex, UK: John Wiley & Sons, Inc.
- Evans, Vyvyan. 2003. *The Structure of Time: Language, Meaning and Temporal Cogn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Eysenck, Michael W. (ed.). 1990.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Oxford: Blackwell.
- Hart, Christopher. 2010.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gnitive Science*. New York: Palgrave.
- Kukkonen, Karin. 2017. *A Prehist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Neoclassicism and the Nov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ech, Geoffrey & Mick Short. 2007. *Style in Fiction: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 London &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 Ramchand Gillian & Charles Reiss (eds.). 2007.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Interfaces*. London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ömer, Ute & Rainer Schulze. 2009. *Exploring the Lexis-grammar Interfac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Stillings, Neil A. 1999. *Cognitive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Zunshine, Lisa (ed.). 2010.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莫里茨·石里克. 普通认识论. 李步楼,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R·巴特. 符号学美学. 董学文、王葵, 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朱丽·汤普森·克莱恩. 跨越边界: 知识·学科·学科互涉. 蒋智芹,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